

中国出版

● 主编 宋原放 ● 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

史料

现代部分

ZHONGGUO CHUBAN SHILIAO

第三卷

下册

● 方厚枢 辑注

山东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出版史料

主 编 宋原放

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

现代部分

第三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下 册

● 方厚枢 辑注

山东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

宋原放 主编

第三卷（上、下）

方厚枢 辑注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话：(0531) 2023919 传真：(0531) 2050104

网址：<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规格：850mm×1168mm 32 开本

印张：36.875 印张

插页：6 插页

字数：500 千字

书号：ISBN 7-5328-3202-3/Z·73

定价：68.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三卷 (下册)

新中国图书出版五十年概述	阎晓宏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出版五十年	吴道弘 (17)
毛泽东著作在北京的出版概况	陈汉孝 (34)
建国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京版图书 出版概况	陈汉孝 (61)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写纪实	仁 教 (78)
鲁迅著作出版工作十年 (1971—1981 年)	王仰晨 (88)
新中国的古籍整理与出版	周 庆 卢新宁 (122)
建国后北京地区青年读物出版概述	林君雄 (133)
新中国少儿读物出版五十年	方厚枢 (150)
《辞海》六十年	罗竹风 王 岳 (162)
《新华字典》五十年感言	陈 原 (170)
陈翰伯和《汉语大词典》	方厚枢 (177)
《中国大百科全书》问世记	金常政 (187)
回眸新中国的音像电子出版业	谢明清 (201)
新中国报业五十年	梁 衡 (208)
附：1949—1999 年全国报纸出版统计	(216)
新中国期刊五十年	张伯海 (219)

附：1949—1999 年全国期刊出版统计	(226)
中国版权制度的建设	宋本文 (228)
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前前后后	刘 杲 (245)
新中国稿酬制度纪事 (1949—1999 年)	方厚枢 (261)
新中国印刷业三十年	王仿子 (293)
新中国书报刊印刷业五十年的巨变	杨方明 (320)
中国新发现的古代印刷品综述	郑如斯 (326)
新中国图书发行事业五十年	郑士德 (340)
我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回顾和思考	王 益 (355)
出版学研究的起源和发展	袁 亮 (364)
中国编辑学研究五十年	邵益文 (374)
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	肖东发 袁 逸 (394)
关于书的几个问题	向 达 (413)
读了《关于书的几个问题》	胡愈之 (421)
十五年书评初议	伍 杰 (426)
人民新历史的开端——《新华月报》代发刊词	(435)
《中国出版年鉴》发刊词	胡愈之 (440)
《韬奋与出版》序	王子野 (443)
《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序	宋本文 (448)
《中国印刷史》序	钱存训 (451)
《书海浮槎文丛》总序	季羨林 (455)

附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五十年大事记·····	(461)
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的图书出版·····	(514)
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刊题录·····	(527)

新中国图书出版五十年概述^①

阎晓宏

一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出版事业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关怀。1949年10月3~19日，新中国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于9月为大会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并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全体代表。朱德同志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准备迎接随着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勉励大家把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一条变为事实，团结一切愿意和可能为人民出版事业服务的人共同工作。1949年10月19日，新中国成立不到20天，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出版总署是在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和新华书店编辑部的基础上成立的，并确定了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图书出版机构与私营图书出版机构对比，力量悬殊。1950年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211家，其中私营图书出版社就达184家。为了改变公私出版力量对比的悬殊局面，出版总署首先加快了公营、公私合营出版机构的建设，按照

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原则，分别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地图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交通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到1957年底，调整、改组出版机构工作基本完成，全国图书出版社达到103家（其中中央55家，地方48家）。到1965年，全国图书出版社为87家，虽有进一步的调整合并（如：建筑、冶金、机械、煤炭、石油、化工、水利、地质8家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中国工业出版社），但基本上维持了1957年图书出版机构的格局。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图书出版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旧中国出版业到社会主义出版业的跨越。图书出版工作的重心主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出版；（2）教科书；（3）一般通俗读物，特别是工农大众读物；（4）少儿读物；（5）干部读物；（6）科技读物。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图书既少且贵。图书出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迅速增加出版物数量，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这样一个首要而基本的问题。胡愈之在1950年新华书店华北总分店第三次分店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到的数据可以反映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在1950年，所有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出版事业加在一起，出版新书恐怕不过一万万册。质量方面且不去管他。单只在数量方面就差得很远，以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计，平均每四五个人方可得到一本新书。”“最近听一个朋友说：在兰州，一本《论人民民主专政》要两块大洋才能买到。华北的山西等地，许多学校买不到教科书，农村办冬学多半还是用很老很老的书。”这种状况也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1955年，在一份《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重视不够》的情况简报上，毛泽

东同志在反映问题的材料旁边分别批注，“书少”，“无人编”，“太贵”。并将简报批给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林枫同志，请他约有关方面设法解决。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书籍又缺又滥》，指出图书出版一方面存在着供不应求的问题，一方面也存在着“一窝蜂”、“赶浪头”出书的问题，在图书总供给不够的情况下又造成了积压和浪费，指出：“提高书籍的出版质量，在任何时候都是出版社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1957年之前，图书出版的发展是顺利的、健康的，关于出版的方针、政策是符合社会发展实际要求的。1958年以后，图书出版受到“大跃进”的影响，许多地区和县都办起了出版社，仅1959年地区和县办出版社就达114家，出版社之间竞相搞起了出书竞赛，有的十几小时就出一种书，1958年的出书总量达到45495种，比1957年的27571种增加了61%。但是相当数量是质量低劣或随意翻印的小册子。“大跃进”停止后，1961年，图书品种骤落为13529种，到1963年图书才出版17266种。

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图书出版虽然经历了这样那样一些曲折，但出版为人民大众的利服务的基本方针始终没有动摇，这期间关于图书出版工作的一些重要原则（如：出版社的基本任务、出版社的分工、图书的质量、价格、教科书的出版原则、面向大众出书的方针等等），关于图书出版的一些重要法规、制度（如：关于出版物的禁载内容标准等等），迄今仍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这一期间取得的成绩，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图书的品种、数量实现了较快的发展，摆脱了图书匮乏的局面，基本适应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需要。1950年，全国出版图书12153种，总印数2.75亿册，全国年人均图书0.5册；到1965年，全国出版图书20143种，总印数21.71亿册，

全国年人均图书3册，这17年间，图书品种增长了约1倍，而图书的社会供给量增长了7.8倍。

2. 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出版了大量经典作品和有重要影响的、优秀的图书。(1) 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等图书的出版。1956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到1965年出到21卷（全集出版于“文革”期间中断，1985年全部出齐）；1960年出版了《列宁选集》第1~4卷；1953年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第1、2卷，全集13卷于1958年出齐；1951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毛选4卷于1960年出齐。此外，还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等等。(2) 在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方面，出版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薛暮桥《政治经济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华罗庚《数论导引》和《堆垒素数论》，钱伟长《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钱学森《工程控制论》等等。(3) 这一时期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鲁迅全集》第1~10卷，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播火记》、《烽烟图》、《烈火金刚》、《在烈火中永生》、《李自成》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家》、《春》、《秋》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玉宝》等；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等。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社从无到有。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5年，全国用蒙、藏、维、哈、朝等19种文字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累计11435种，总印数累计7933万册。这

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辞书工具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辞典》、《俄汉大辞典》。整理出版了古籍《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全唐诗》、《全宋词》等。

3. 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一些奠基性工程着手规划并开始进行。如：中央于1958年批准成立了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并确定以中华书局为主要出版机构；批准成立了世界学术著作翻译和出版规划小组，确定商务印书馆为主要出版机构。又如：1957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成立了专门的编辑机构，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修订重编大型辞书《辞海》；关于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始于这一时期，1959年初步拟定了《关于筹备出版百科全书的初步设想》，拟由中央负责同志挂帅，吸收各方面专家成立百科全书学术委员会，并成立百科全书出版社作为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一计划因“反右倾”、“文革”而搁置，未能实施。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虽有曲折，但出版方针和原则是基本正确的，从总体来看，发展是健康的。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的十年，基本培育形成的社会主义出版生产力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与破坏。

“文革”开始不久，国家以及各省市区的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即陷于瘫痪，全国各出版机构和出版工作也处于停滞状态。

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已完全脱离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需要服务的轨道，完全脱离了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的基

本方针，图书出版表现出扭曲、畸形的状态。

在当时的形势下，出版毛泽东著作是出版工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据统计，仅1966年至1970年底，全国正式出版毛泽东著作、语录本、单行本、民族文本、外文本、盲文本共计42.06亿册；正式出版毛泽东像和毛泽东单张语录62.27亿张，两者合计为104.33亿册（张），而同一时期全国出版的图书总计为129.27亿册（张）。也就是说，毛泽东著作、语录、毛泽东像等的出版量已占1966年至1970年全国所有图书出版量的80.7%。

在“文革”期间，仅次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物是样板戏剧本、曲谱、画册的出版。据统计，仅北京地区1970年9月到1971年9月，一年内出版的《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沙家浜》4种样板戏的普及本、总谱、画册等就达2718.1万册，平均每个样板戏印制量679.5万册。

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结构也是畸形的。以1970年为例：1970年全国出版图书4889种，总印数17.86亿册（张），除去毛泽东著作、图片、中小学课本这几类，其他图书共计出版2773种，总印数9.12亿册。只分析这2773种图书的结构，畸形与严重不合理的状况仍是十分突出的：（1）政治读物1843种中，993种是汇编报刊文字；（2）文艺读物393种，样板戏剧本、曲谱、画册就有245种；（3）科技读物仅有298种。

这种状况从“文革”后期开始得到一定的调整与改善。1968年，毛泽东派女儿李讷看望范文澜，希望他把《中国通史》写出来（这项工作范老病逝后，由他的助手蔡美彪和其他同志通力合作，从1978年至199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齐）。1969年，解放军驻文化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到中央指示：要出版青少年读物、农村读物，满足工农兵和青少年、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要求。1971年《新华字典》修订本在周恩来关怀下出版，征

订数达 8482 万册。1971 年，在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下，中断了 5 年的“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在“文革”后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怀和推动下，出版了《马恩列斯毛论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中国通史简编》；出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及《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等书；翻译出版了《阿登纳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林肯传》等等。

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由此推进了图书出版工作的根本转变，图书出版迎来了春天。

由于“文革”期间对文化的摧残和破坏，“文革”后社会面临着严重的书荒，为了迅速地缓解巨大的社会文化需求与书店无书可售的局面，国家出版局于 1978 年 3 月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 13 个省市出版局（社）和部分中央出版社，在大力组织新书出版的同时，要求对“文革”前出版的图书进行审读、修订，并决定重印 35 种中外文学名著尽快出版。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禁锢的书于 1978 年“五一”节期间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统一发行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供不应求。

广大人民群众对图书的渴望，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1979 年 3 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讲话中要求：“思想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

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当时出版的一批新书的发行销售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社科院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销售了 500 多万册；司法部编写的《农民法律常识读本》、《工人法律知识读本》分别累计发行了 1220 万册和 1212 万册，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累计发行了 1400 多万册，唐敖庆的《BASIC 语言》累计发行了 580 万册，韩树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累计发行了 500 多万册，《先秦哲学寓言》发行了 270 多万册，上海工艺编织厂编写的《上海棒针编织花样 500 种》累计发行了 1227 万册。这种图书出版高印数的现象从“文革”结束后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中期，一种新书的印数达到几十万册是很平常的，这种现象至今仍使许多出版人兴奋、诧异并留恋不已。

一批在“文革”中停办或合并的出版社开始恢复重建。这批恢复的出版社先后有 33 家。与此同时，自 1977 年至 1982 年共新建出版社 99 家。在“文革”结束后的 1977 年全国共有出版社 82 家，到 1982 年全国出版社发展到 214 家，是 1977 年的 2.6 倍。

这一时期，图书出版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1977 年，全国出版图书 12886 种，其中新书 10179 种，总印数为 33.08 亿册（张），到 1982 年，全国出版图书达到 31784 种，其中新书 23445 种，总印数达 58.79 亿册（张）。短短几年时间，图书品种 1982 年比 1977 年增长了 146.7%，其中新书品种增长了 130.3%，图书总印数 1982 年比 1977 年增长了 77.7%。

1983 年 6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出版工作最为重要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对新时期以来的出版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书荒”现象得到基本扭转的同期，在中央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图书出版在抓新书和重印书出版的同时，还着重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大型图书的出版工作，一是各类图书的出版规划工作。

在大型图书的出版工作方面：1978年，国家出版局委托人民美术出版社邀集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地美术出版社商讨分工协作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问题。1978年，国家出版局、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向中央请示，建议尽早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同年，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任的总编辑委员会。1979年，《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组长陈翰伯写信给胡耀邦，汇报编写的进展与存在的困难，建议在上海成立《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作为具体执行机构，胡耀邦即予批示：“原则同意，请努力进行”。《汉语大字典》编写领导小组组长许力以向胡耀邦书面汇报情况，反映编写的情况和困难，建议在四川成立编纂处，负责日常工作，胡耀邦批示：“请川鄂两省有关部门大力协助进行。希望全体编写同志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这些图书的出版工程大多是经过十几年在“八五”期间才完成的，但创建工作、基础工作始于改革开放之初。

在出版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方面：1978年，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讨论制定了《1978—1980年部分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局联合全国科协组织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普图书出版规划》，《规划》共包括62套科普丛书和读物。1982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制定了《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同年8月，国务院原则批准。1983年文化部印发了《1981—1990年全国出版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纲要

（草案）》提出，“图书出版要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品种，保证重点，填补缺门，重视普及，注意提高”。1986年，国家出版局着手组织制定《全国辞书编纂十年规划》。同年，国家出版局还在沈阳组织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会议。这些规划的制定，说明图书出版开始进入规范化、有序化的过程。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所限，以及后来客观环境的变化，当时分别制定了不少规划，但有一些完成的情况并不理想。

新时期以来，出版改革的逐渐深入，为图书出版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1979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突破了地方出版社长期以来的“三化”方针（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提出地方出版社可以试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极大地调动了积极性，解放了占全国出版社近半数的地方出版社的生产力。1988年，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对出版社改革的指导思想：优化选题、调整图书结构；逐步推行社长负责制；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改革分配制度；开辟多种渠道，扩大出版能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加强出版社改革的领导等8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到80年代末，出版社由纯事业单位，逐渐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单位；基本完成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

进入90年代，我国的图书出版已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顺利实施并完成，一大批我国图书出版的标志性工程相继完成。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吸收了以往制定与实施各类型图书规划的经验，注意反映并兼顾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各行业、各学科发展的需求，特别注意吸收了国家“七五”社科、科技、古籍、整

理等方面的成果，总计收入重点图书选题 1073 种。1996 年底，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顺利完成，除少数项目将顺延至“九五”期间出版外，全部完成出版的项目达 1118 种，占全部项目的 96.1%，实现率很高。随着规划的完成，一大批重点图书相继问世。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列宁全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1~3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美术全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当代中国丛书”、《乾隆版大藏经》、《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通史》（10 卷本）、《机械工程手册》、《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丹珠尔》（藏文）、《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全宋诗》、《全唐诗》、《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等等，其中许多被称之为中国出版史上的标志性工程。1996 年，由新闻出版署主办的“中国出版成就展”，其中图书成就部分格外引人注目，540 家出版社共展出了 38281 种图书，相当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新书品种的 10% 左右，但是已充分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图书出版取得的成就，也展示了图书出版自身的实力。江泽民、乔石、刘华清、丁关根、李铁映、邹家华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展览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从这一时期图书出版的品种和印数以及出版社的发展情况，也能看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后，图书出版初步繁荣的景象。1978 年全国图书出版共 14987 种，其中新书 11888 种，重印率为 20.7%，总印数为 37.74 亿册（张）。到 1994 年，全国图书出版达 103836 种。图书品种增长了 592.8%，重印率增长了 58.4%，总印数增长了 59.2%。出版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78 年，全国只有出版社 105 家，到 1994 年，全国出版社已发展到 514 家，出版社增长了 389%，形成了以中央部委出版社、